

政治经济学史

第三卷

卢森贝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Д. Розенберг
Докто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асть треть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36
根据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局1936年版译出

政治经济学史

第三卷

(苏)经济学博士卢森贝著

译者：郭从周(序言、第1—6章及有关参考书目)
北京编译社(第7—10章及有关参考书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77,000字
1960年1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4002·267 定价 1.25元

目 次

序言	1
----------	---

第一編 經濟自由主义

第一章 自由貿易主义	5
曼徹斯特“学派”	12
曼徹斯特派及其敌人爭夺工作	17
自由貿易派的共同观点	21
第二章 納薩·威廉·西尼欧（1790—1864）	26
概述	26
西尼欧的四“原則”	31
財富和价值	35
資本和利潤	38
壟断和地租	43
工資和利潤	47
第三章 庸俗經濟学和法国自由貿易派	51
法国經濟自由主义的特点	51
30—40年代的法国經濟	54
階級斗争和政治制度	58
第四章 弗列德里克·巴师夏（1801—1850）	71
生平和活动	71
巴师夏的方法論立場	78
交換和价值	83

生产者和消费者	89
资本的利息	93
地租和土地占有制	98
巴师夏“学说”的王冠，或者社会进步的“规律”	100
小结	102

第二編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簡要的叙述

第五章 聖西門学派的演进和瓦解	113
簡短的概述	118
皮叶尔·勒魯 (1797—1871)	123
勒魯的观点	127
第六章 傅立叶主义的发展	131
I 傅立叶和他的門徒	131
II 維克多·孔西德兰 (1808—1893)	134
生平和活动 (134) 社会經济观点 (138)	
III 傅立叶主义和劳动权	144
历史的考証 (144) 社会主义文献中的劳动权 (146)	
第七章 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派別	149
I 路易·勃朗和路易·勃朗主义	149
路易·勃朗 (1811—1882) 的生平和活动 (150) 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和以后几年中的地位 (151) 作为資本主义的批判者的路易·勃朗 (154) 作为社会改革家的路易·勃朗 (160) 路易·勃朗的劳动权利 (166)	
II 君士坦丁·培可尔 (1801—1887)	168
培可尔的社会經济观点 (171)	
III 弗朗苏阿·維达尔 (1812—1872)	178
第八章 卡貝和“伊加利亞共产主义”	184
I 艾梯延·卡貝 (1788—1856)	185
II “伊加利亞游記”	192

卡貝的道德—哲学观点和社会—經濟观点 (192) 伊加利亞
的發生經過 (200) 伊加利亞的共产主义結構 (204)

第三編 蒲魯东主义

引言	211
第九章 比埃尔·約瑟夫·蒲魯东 (1809—1865)	223
I 蒲魯东活动的第一时期——1848年革命以前	223
家庭和青年时代 (223) 第一部著作 (225) “什么是財 产” (226) 主要哲学著作 (232) “經濟矛盾的体系” (235)	
II 蒲魯东活动的第二时期——二月革命以后	237
蒲魯东是社会改革家 (237) 政治活动 (240) 国民銀行 (243) 監禁和新書 (245) 第二帝国和蒲魯东对它的态 度 (249) 經濟学新著 (253) 蒲魯东的被放逐及其最后 著作 (256)	
第十章 蒲魯东的經濟学說	258
I 一般前提和方法	258
經濟自由主义和蒲魯东主义 (258) 蒲魯东主义和民粹主义 (264) 自由貿易和宗法制度 (270)	
II 方法	274
邏輯的和历史的方法 (274) 蒲魯东的矛盾。分工 (281) 机器 (285) 竞争 (288) 壟断 (291)	
III 蒲魯东的“体系”及其“基石”	294
价值的二律背反 (295)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299) 貨 幣 (305) 交換和銷售 (309) 分配 (313)	
总結	313
参考書目	322

序 言

“政治經濟学史”第3卷是以李嘉圖学派解体而結束的第2卷的繼續。但是政治經濟学正是以庸俗的形式——在詹姆士·穆勒，麦克洛克等的叙述中——在英国資產階級中間获得了广泛的傳播，成为行动的指針。資產階級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站在自由貿易主义的旗帜下，自由貿易主义不外是在庸俗經濟学家（我們再說一次）的叙述中古典学派結論的实际应用。

但是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中，英国无产階級已經显著地成長了，而資產階級在和无产階級斗争中是需要額外的武器的（在第2卷第16講叙述了19世紀初几十年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这种額外的武器便是西尼欧的“节欲”論。

本書前两章的研究对象是英国的自由貿易主义和西尼欧的主張。

自由貿易主义的故乡是英国。但它主要的“理論家”和喉舌，却是法国人巴师夏。巴师夏把用自由貿易形式以實現經濟自由主义，“看成”是實現“經濟的和諧”。我們在其次两章中考察法国自由貿易主义产生的諸条件、它的特点和这些条件在巴师夏著作中意識形态的反映。

我們称为“經濟自由主义”的本書的第1編，就写到这里为止。

作为起初反对重商主义，后来反对土地貴族的一个流派而誕生的經濟自由主义，在我們考察的时期內，以其主要武器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这一点在法国表現得最尖銳和最清楚，法国在30年代和40年代，社会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傳播。

法国社会主义的各种变形，和它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对物，則在第2編中加以研究。

这一編和“政治經濟学史”第2卷各講一脉相承，各講中叙述了偉大空想主义者和李嘉圖派社会主义者的学說(第14、15、16、17、18講)。但是30和4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只有在本書所叙述的段落和順序中才能够理解，因为正是这样叙述的順序提供了可能，来具体地研究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产物的社会經濟思想^①。

我們特辟一編叙述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的著者是小资产阶级矛盾的存在和意識最明显的体现(化身)，他从这个立場来斗争，既反对私有制，也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实标上他的斗争不外是小资产者不断的动摇。

*

*

*

本書是在科学院經濟研究所完成的。我特別認為有必要表揚科学研究員烏斯宾卡婭的工作。烏斯宾卡婭同志选择国外第一手的材料。大部分外国書籍中的引文是由她翻譯；参考書目也是由她編的。

著 者

^① 在叙述英国自由貿易主义时，我們不再談当时英国的經濟和政治环境了。这个时代在第2卷各講中已經加以闡明了。

第一編 經濟自由主义

經濟自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和理想。它所規定的規律——在價值、利潤、地租、工資等等理論上——以無限的競爭自由為其前提。古典派假定競爭自由是可以實現的，他們研究了從這種事態發生的種種關係。同時古典派知道，這種情況還不存在，因而以促進其實現為自己的任務。

庸俗經濟學也是從經濟自由出發，把它作為前提，並且為它的實現而鬥爭。但是古典派和庸俗經濟學家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古典派應用在資產階級眼光範圍內可以達到的科學方法，力圖揭露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理現象”；因而他們奠定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础。恰好相反，庸俗經濟學家把事物的表面現象和它們的實質等量齊觀，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種多余的科學。因此，“……庸俗經濟學却只在外觀上的聯繫上面打轉轉，為了想要給最常見的現象以表面上也說得過去的說明，並且為了資產階級日常的需要，像反芻一樣，不絕咀嚼科學經濟學許久以前已經供給的材料”^①。

但是庸俗經濟學正因為它有這些特質，所以才為廣泛的資產階級人士所了解。當資產階級進而有組織地反對那些阻礙他們充分開展其企業活動的土地貴族的特權時，他們站在庸俗經濟學的旗幟下，庸俗經濟學“……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他們自己的最善世界所抱的平凡而自大的見解組織一下，墨守着，並稱其為永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65頁。

远的真理”^①。

19世紀30—40年代这些平凡的永远的真理之一，就是貿易自由。薩伊，麥克洛克，西尼歐剽窃了古典派的經濟自由思想后，就能“使这种思想适应資產者的日常生活”，在資產者的头脑中，这种思想是从資產者貪求占有最大剩余价值“發展起来”的。

古典派把經濟自由看成是社会生产力發展的条件。資產者实行家把經濟自由(庸俗經濟学家帮助他領会这个真理)看成是迅速致富的方法。但是挡住去路的，有土地貴族，尤其是由于谷物条例，他們抓取了根据自由竞争“規律”屬於資產者的極大部分。因而資產者进一步反对“篡夺者”——侵犯他的“合法的”鹵获物的地主。

“反对谷物条例同盟”成立了，整个8年(1838—1846年)中領導了自由貿易派反对保护主义派的斗争。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65頁。

第一章 自由貿易主义

英国經濟自由思想老早已經开始宣傳了。这种思想第一个最徹底的拥护者，被認為是17世紀的商人兼經濟学家台特萊·諾芝(1641—1692)。实际上我們在諾芝的著作中已經找到許多关于經濟自由思想的明白的表述。我們从其中引証几段。“牽涉到貿易的整个世界，仿佛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而各个国家等于一个民族的个体。”“政府的任何法律都不能規定貿易价格，貿易价格应当自行确定，如果有这种法律存在，則它們会成为貿易的巨大障碍，应当受譴責。”“任何一个民族通过国家措施是不能致富的，只有和平、爱好劳动和自由才創造了貿易和財富。”^①

在上面引証的几段話中，基本上提供了后来自由貿易主义的整个根本信念。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資本主义經歷的長期的發展道路，使自由貿易主义和諾芝有了距离。經濟自由的思想具体化起来，成为階級斗争的实际旗帜，并且在資本主义發展的每一阶段上，都具有明确而具体的內容。在諾芝时代，諾芝所表述的經濟自由思想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当时居于巩固統治地位的重商主义的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沒有各种壟断和特权的协助而不能發財的商人自身，大多数还是拥护重商主义体系的。那时重商主义也和組織在行会中、紧握行会特权的手工业群众的利益和思想充分适应的。只有先进的商工业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感覺到重商主义的

① 关于諾芝參閱本書第1卷，第4講。

措施束縛住資本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們用經濟自由原則的形式，表述了他們廢除這些措施的要求。

和資本主義發展“步調一致”的經濟思想的更一步的發展，擴大並且加深了對重商主義體系打開的缺口，最後使這一體系瓦解。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一書中也已經能夠建立一個以經濟自由原則為基礎的新的體系。詹姆斯·斯圖亞特(1712—1780)妄想使重商主義復辟的企圖，結果完全失敗了。但是在理論上，在政治經濟學上，卻達到了這種境地。重商主義在實際上，在經濟政策上，還遠沒有被克服，因為政權掌握在那些極願保持壟斷和許多以前特權的人們的手中。可是指出以下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即是在經濟政策上，重商主義也成為另外一種東西，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英國由一個農業國蒸蒸日上地變為一個工業國。從此英國和世界市場的關係增加了。這也使重商主義政策的性質和內容發生了變化。英國重商主義從國家政權管理和干涉經濟生活的完整體系，變為保護主義，保護主義絕不侵犯個人的創造精神和自由競爭，它的目的主要是保護農業，抵抗不利的外國競爭。但是重商主義就它的階級內容說，逐漸由商業資本的思想體系變為大的土地占有者的思想體系。(這個過程是在18世紀之末，19世紀之初即產業革命時代最後完成的。)

英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過程，引起了大地主的應有的不安。工業的發展當然給農產品創造了市場，從而也給地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是第一，必須保護這種市場；第二，必須採取種種措施把資本吸引到農業上。在18世紀末葉以前，英國是向國外輸出谷物的。此外，為了鼓勵農業，谷物出口商還得到獎勵金。但是1793年是谷物在英國貿易差額中以輸出品而出現的最後一年。鼓勵農業的制度也相應地發生變化：如果以前這種鼓勵在於獎勵谷物輸出(如上所述)，那末在1793年後已經開始管理谷物輸入以便達

到保持谷物价格于一定水平的目的。这个目的也是1815年谷物条例所追求的，由于整整33年圍繞着它的如火如荼的殘酷斗争，所以它是那样的享有盛名呵。

政治经济学走在经济政策的前面。政治经济学适应着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经济政策是由大地主在发了財的农民和工商业上层分子支持下奉行的。自由政治经济学和保守反动经济政策之間剪刀差的距离，在19世紀前几十年特別增大了。我們要記住，在谷物条例頒布两年之后，李嘉圖的“政治经济学和課稅原理”出来了。怎样相反的事呵！

总结了工場手工业时期經驗的斯密，把他的打击指向旧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虽然已經被打伤，但是还没有被打死。“国富論”中当然提供了詳尽的論据以反对各种保护主义，但是我們还要重复說一句，斯密把他全部学說的鋒刃指向已經垂死的旧的重商主义，而不是指向当时的大地主。不仅如此，甚至在斯密的著作中，土地占有者能够找到滿足他們野心的某种支柱。沒有摆脱重农主义影响的斯密，把农业放在工业之前，提倡吸收巨額的資本于农业^①；他的地租論的变形之一，實質上就是为地租辯护^②。斯密誠然不是农业保护主义的拥护者，但是农业保护主义的拥护者們却能在斯密的著作中找到某种支柱。

李嘉圖——产业革命的經濟学家，用另一种方式来研究經濟自由的問題。李嘉圖毁灭了旧重商主义的一切基础。对于用机器技术武装起来、准备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工业，經濟自由的問題，成为“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問題并不在于私人的創造精神是必需的，并不在于政府的监护是有害的——凡此一切已經不言而喻。問題在于英国工业为要夺取世界市場，除开机器技术外，还需

① 參閱本書第1卷，第8講。

② 同上。

要廉价劳动。而廉价劳动以廉价谷物为前提，而这一点在实行谷物条例的条件下是沒有可能的。

由此可見，李嘉圖时代經濟自由的具体內容，首先归結于谷物輸入的自由。当然，李嘉圖不能这样簡單地和这样偏窄地（我們假定說）解决这个問題——他必須重新考虑經濟自由的一切前提和影响，給予它們严整的理論形式。但是他重視的一点，就是谷物条例。无怪封建世界的代表人物对他的“原理”采取了如此敌对的态度。使他們战慄的，不是他的抽象方法和抽象見解（这一点只为了轉移視線才說），而是具体的結論，也包括对經濟自由这一口号內容的具体解释。

經濟自由的要求得到極為具体和战斗的內容后，就把广大的和各种各样社会階層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工业資產階級領導了这个运动，它利用了由于产业革命和拿破侖战争而引起的人民群众的困苦和貧穷的机会。如果在工业資產階級看来廉价谷物意味着廉价劳动，那末接近自由貿易論者的某些工人階層^①認為相反，廉价谷物提高了他們的实际工資。而广大人民群众把廉价谷物看成是緩和他們極端貧穷和困苦的一种手段。

資產階級發动了一个用請願来进攻議会的运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曼徹斯特——英国棉織工业的堡壘）的商会的請願書如雪片飞来。曼徹斯特商会在它致議会的請願書中（1822年）写道：“如果不廢除谷物稅，工厂工业就不可避免地要毀灭，只有在广大範圍內应用自由貿易原則，才能保證工业的更进一步繁荣和国家的安宁。”議會指派了一个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其报告中得出如下的結論：

① 自由貿易主义起初也得到工人的同情。但是它的真正本質迅速地暴露出来。它的許多工人拥护者迅速地不見了。但是当30年代自由貿易論者組織“反对谷物条例同盟”，而工人站在宪章主义旗帜下时，他們两家終于分道揚鑣了。

“壟斷可以存在或可以容忍的时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貿易現在不受什么壓迫，它成為國與國間相互友好的源泉，而生產品的交換要發展工業、增加財富和全人类的幸福……委員會想到，逐漸接近更健全的制度，应当是一切貿易規章的基礎，這一點符合大不列顛的利益，不亞于符合周圍一切國家的利益……”

議會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做了許多讓步——發布了几个法令，大大削弱了航海法的效力^①。托利黨的閣員康寧不得不聲明：“我們的財富和工業，我們的園滑和福利号召我們和其他國家自由來往。”但是谷物稅沒有廢除——它是爭奪經濟自由所陷入的不可動搖的障礙。

資產階級迅速地了解，只要議會掌握在它的敵人手里，那末它廢除谷物條例的一切努力都是無用的。因此，它特別熱心於恢復議會改革的鬥爭（在對法戰爭期間這種鬥爭延擱了）；這種改革在1832年實行了，它把廢除谷物條例的鬥爭提高到一个可以說是新的階段。

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但是它不能立刻在經濟上體現自己的政治勝利。工人階級已經能夠上巨大的階級鬥爭學校^②；大地主和資本家在共同敵人——無產階級的面前，在他們兄弟般的爭吵中必須十分小心和穩重。當然，口頭上的鬥爭採取了更激烈的形式——家內的爭執往往演變為互相責難，好似對方罪大惡極。而事實上，無論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都關懷他們所依據的基礎的保護和鞏固。

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決定的影響。大家知道，馬克思有以下的指示：“從此以往（指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盧森貝），無論從實際方面說，還是從理論方面說，階級鬥爭

① 關於航海法參閱本書第1卷，第7講。

② 關於工人階級運動參閱本書第2卷，第16講。

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正确或不正确，而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的偏见和谄媚……”^①

古典学派，特别是李嘉图成为不可靠的了。他们所揭露的，大大超过了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李嘉图揭露了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而这一点被顺利地用来进行反谷物条例的斗争。但是他也揭露了利润和工资的对立，而这一点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绝不符合的。保卫资产阶级制度，也包括经济自由在内，在新的阶段上，需要对资产阶级更加可靠的斗士；庸俗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斗士。

指出下面一点是重要的：经济自由思想的内容，在新阶段上又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想渐渐成为反工人的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斯密对于在他的时代以前保存下来、束缚个人创造精神和自由的中世纪同业公会采取敌对的态度。他是劳动自由的拥护者；但是他所理解的劳动自由，是废除中世纪的束缚，这种束缚使劳动人民定居一定的地点并死守一定的职业。斯密认为只有在财富增加的国家，工资才可能增加^②，他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当然不能重视工人的团结和罢工。但是他并不谴责他们；恰好相反，他在为他们作辩护时着重指出，雇主常常暗地里联合起来，默不做声地阴谋反对工人。

李嘉图实质上也站在这个立场。从他的工资论中可知，工人的团结和罢工不能影响工资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工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参阅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11页。

② 参阅本书第1卷，第8讲。

論变为对工人进行斗争的工具，他在下議院热烈拥护团结权，认为是工人不可分割的权利。李嘉圖把工人的团结并不看成侵犯经济自由，这一点仿佛和斯密的见解相同，李嘉圖也認定工人的团结，只是对抗企业主的隐秘的团结。

随着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發展，随着它的矛盾的發展和随着资产階級掌握政权，形势發生了激烈的变化。人們“看不見”穩秘的企业主的联合，更确切些說，人們把它們看成是某种自然的东西，人們以保护经济自由的旗帜为掩护，来对工人的团结开火。1824年以前，工人的团结当然为法律所禁止，認為工人联盟是“阴谋团体”。但是当时是主要由警察的尺度来对待它們：把它們看成是混乱和革命的策源地。而在1842年以后，工人联盟已經合法化，对它們进攻的，已經不是旧世界的代表，而是以庸俗经济学家为首的自由资产階級，他們喋喋不休地硬說什么工人联盟和经济自由原則不能相容。

经济自由的原則也变为反对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武器，根据下列的理由来譴責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仿佛它們奴隶个性，压迫私人的倡导精神和創造性。

由此可見，经济自由从一个反对中世紀遺習和殘酷奴役个性的进步斗争武器变为反对唯一革命階級——无产階級的斗争武器，而无产階級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人类，使人类摆脱各种压迫和剝削。

*

*

*

英国爭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初，爭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就是反对商业資本思想体系的斗争，这种思想体系几百年中形成为重商主义的理論观点和經濟政策的体系。后来这个斗争成为反对土地貴族特权的斗争，这种特权把重商主义变成保护主义，主要是农业保护主义。最后，爭取经济自由

的斗争，变成以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为主的斗争。在前两个阶段，经济自由的口号是进步的，在第三个阶段，它成为反动的和反革命的。

这当然不是说上述各阶段像万里长城一样彼此隔离开。没有可能决定精确的年月日，截然划分这一阶段和那一阶段的界限。恰好相反，在每一阶段很容易发现另一阶段的种种因素。问题只是在于为经济自由而斗争的某一阶段的优越性质，也可以说是主导的特点。

曼彻斯特“学派”

从17世纪末叶起和托利党先后统治英国的辉格党不是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毋宁说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巨头与部分大地主的联盟，这些大地主与羊毛和亚麻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即与农业有密切联系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利害关系。辉格党领袖的供应者主要是古老的贵族家族。

当然，辉格党比托利党更接近于工业资产阶级，随着发展的程度，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逐渐成为辉格党的活动分子。但是基本上依靠贵族集团的托利党，也不得不考虑形成大不列颠权势的资本的利益。托利党人借助常常不满意辉格党人政策的工业资产阶级，往往代替辉格党人的政权。

总之，这两个政党都为工业资产阶级服务，但工业资产阶级自己的政党却没有。他们最迫切的利益就因此而吃亏。不仅托利党人，就是辉格党人也因为他们的阶级成分和历来的传统，不能充分实现工业资本所需要的经济自由。当时需要的，或是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或是使现存的政党沿着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分裂的路线而分道扬镳。后者的情况发生了。托利党人摆脱了倾向工